

20世纪中国出版文化丛书

广西教育出版社

CONG YINSHUA ZUOFANG DAO CHUBAN ZHONGZHEN

从印刷作坊
到出版重镇

吴相著



G233.22/7

20世纪中国出版文化丛书

从印刷作坊 到出版重镇

吴相著

广西教育出版社

20世纪中国出版文化丛书
从印刷作坊到出版重镇

吴相著



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鲤湾路8号

邮政编码：530022 电话：5850219

本社网址 <http://www.gep.com.cn>

读者电子信箱 master@gep.com.cn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12.375 印张 插页 4 227 千字

1999年9月第1版 199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 000 册

ISBN 7-5435-2899-1/G·2187 定价：3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小引 商务印书馆在历史上的地位

商务印书馆的诞生迄今已整整一个世纪。很长一个时期以来，她对中国现代文化教育事业的贡献并未获得足够的重视和应有的评价，但在国外，商务却成为博士论文题目，学者们把她作为专题来加以研究。这些学者积极发掘史料，或不辞万里到中国来进行实地考察，访问商务前辈，以客观的立场探求真理，从文化、教育、出版史的角度来研究商务的历史地位，筚路蓝缕，功莫大焉。直到 80 年代，国外学者有关商务或涉及到商务的研究专著才渐渐为国内所了解，引发了国内学者对商务的关注。1970 年，弗罗伦斯·钱(芝加哥大学)以《商务印书馆与现代

中国出版》为题,撰写了硕士论文;现任法兰西远东学院院长的戴仁先生,在1972年以《上海商务印书馆》为题,撰写了他的博士论文;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叶宋曼琪女士在80年代初,对商务代表人物张元济进行了精湛的研究,只可惜她是以人物作为研究对象,当然其中大量涉及到商务印书馆。近几年来,关于张元济的研究专著先后有多种出现,商务印书馆作为张元济生平的舞台、作为背景也屡被提及。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我们认识的加深,商务百年来的沧桑历史展现在我们眼前,她像一位世纪老人,历经中国现代出版、文化教育直至中国现代史的浮沉变迁,为中国现代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个出版家的诞生与成长,在近现代中国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时势催促出版家的诞生。然而要能生存下来,并发展、壮大,成就她的百年事业,须有何等力量。一切都与她所处的时代、社会氛围相关联。中国近现代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出版机构何止百数十家,但经过岁月的历练,先于商务印书馆的近代出版机构已无一幸存,即使同时代建立的出版机构也多有劣汰。商务印书馆诞生于中国社会由传统的、行将没落的封建帝制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大转折、大动荡时期,正因为在大动荡时期,政治的管制松懈,可以把握机遇,开辟崭新领域;正因为在转型时期,现代社会的规程、秩序、社会组织结构直至行业发展的基本模式尚未确立,可以有更多的可能性,探索、发明、大胆实践。一穷二白的基础其惟一的优势就是为创业者提供了驰骋的广阔天地。说到底,商务的创业者们正是顺应了时代的潮流,把握住了历史

的机遇。

综观中国现代出版事业的历史，商务印书馆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她在 20 世纪 30 年代所达到的成就，至今仍令我们惊叹。而她 100 年来所走过的道路也让我们深思。由于出版业所具有的多重性质，由于现代中国社会政治因素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人们看待历史问题的立场观点常常以政治为标的。民族资本家，尤其是商务印书馆这样有良知、有理想，为中华民族作出过重要贡献的文化企业一直被忽视，这种情况实在有欠公允。近几年来，随着人们对张元济的认识日益提高，更主要的是，人们渐渐丢掉思想框框，有了更高、更长远的识力，促进了对商务的研究，人们也才慢慢认识到商务作为中国现代出版业源头的地位。

这个赞誉如此之高！在 20 世纪与 19 世纪之交、新兴出版业即将萌发之际，商务印书馆是否可以称作中国现代出版业的源头呢？这个命题理当给出证明。

何谓现代出版？笔者并不打算给出一个教科书式的定义。但现代出版诞生的标志至少必须具有四个方面的内涵。其一，必须运用现代印刷技术，采用铅活字排版，大机器印制；其二，生产必须具有一定的规模；其三，必须采取现代经营管理手段；其四，也是现代出版必须具有的最重要的精神内涵，即出版者的主体意识，换言之，出版者必须具有一定的文化理想。

这样几个标准，商务印书馆创立前的近代出版机构都并不具备。虽然他们都已渐次采用现代印刷技术，但在生产规模、管理手段方面都还存在欠缺，最主要的是，他们都还没有形成出版

者的主体意识，只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雪泥鸿爪，便悄然消失了。惟商务印书馆历百年风霜而常青，甚且作出较大贡献。大浪淘沙，历史并非是一个玩笑。

研究商务印书馆，也就是探究这样一个文化企业如何在风雨飘摇的现代中国社会站稳脚跟，团结一批知识精英及中国当时素质最优秀的工人阶级，把自己的文化理想投注到社会的进步事业中，找出一个文化企业从生存到发展的精神原动力及其发展模式。

今天，我们仍然处在一个大转折时代，中国出版业正经历着历史上空前的繁荣，也仍然有它的困难和有待解决的问题。比如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笔者每届都前往参观，每每感慨不已。比起国际出版同行，无论是印装质量，还是图书选题，我们都还有漫长的路要走，更遑论出版新领域的开拓了。商务的成敗得失相信会给我们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目 录

小引 商务印书馆在历史上的地位 (1)

第一章 在世纪的转换点上

- 一、时代的催生 (1)
- 二、西学东渐 (16)
- 三、一个出版家的诞生 (41)

第二章 最初的奋斗

- 一、出版家的社会职能 (47)
- 二、商务的创办人 (54)
- 三、严复与林纾 (65)

第三章 引进西学 开启民智

- 一、商务编译所的创办 (79)

二、编辑新式教科书	(100)
三、《东方杂志》.....	(115)
四、从《政学丛书》到《汉译世界名著》.....	(137)

第四章 传统文化的承继者

一、涵芬楼	(157)
二、整理国故	(164)
三、《四库全书》拟重印经过	(183)

第五章 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

一、办学：从幼稚园到职工夜校	(196)
二、张元济的人才观	(208)
三、东方图书馆	(224)

第六章 出版家的立场

一、在政治的夹缝中	(235)
二、为新文化推波助澜	(247)
三、蓬勃的工运	(273)
四、吁请民主	(287)

第七章 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

一、和金港堂的合作	(295)
二、奠定中国出版业的组织结构	(304)

三、商业上的成功.....	(330)
第八章 衰落：与民族共患难	
一、“一·二八”劫难	(348)
二、为国难而牺牲.....	(356)
三、坚持与抗战.....	(364)
结语 又在世纪转换点上.....	(374)
后记.....	(383)

第一章 在世纪的转捩点上

一、时代的催生

1840年以后的中国近代史，涕泗交零，纷纭繁复，是衔接古代与现代的一个转型时期。社会的转型，往往是一个历尽痛苦的过程，交织着各种因素、各种势力的影响和搏杀，同时，也是“创造历史”的时代巨子们把握机遇、创造辉煌的时间舞台。

中国近代史，因施加其影响的原动力是多重的、多层面的，因此，它选择前进的方向便几经曲折。最终，历史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它在众多学说中脱颖而出，由中国共产党人加以实践，取得了中国的政权。一种学说，一种力量，要对中国的现实有更切实的功用，要赢得人民的支持、信赖，才有可能赢得政权。革命的胜利并非完全出自历史的偶然。

推动历史进步的诸种力量，并不全都采取革命的方式。比如文化、教育工作，只能是一种渐进的影响方式，其功用并不能一蹴而就，要等若干时间才能看到成效，而这种成效往往又更为

坚实。从 1840 年到 1949 年,这 100 余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因其纷纭复杂,因其黑夜茫茫,一大批志士仁人,无论其属于何种党派,来自何种阶级,都在为中国的未来或抛头颅、洒热血,或含辛茹苦,孜孜探索。这 100 年,中华民族从古代文明的辉煌期,沦落到黑暗、懦弱无能、任人宰割的境地,已堕落到腐败的最边缘。国内政治昏暗无明,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瓜分势力范围,这个巨大的逆转简直无从找其原因。从当下看,似乎可以归结为清朝统治者的腐败,但从历史的长时段看,中国社会的体制、结构,是农牧社会的经验型管理体制,未能采取数字化的管理。^①政治上是专制的封建统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根本没有主权在民的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未能发挥所长,迎接挑战,发生创造性的转化,以迎来社会的现代化。因此,在工业革命之后发展起来的西方诸列强一跃而超过有 5000 年文明史的中华帝国,挟坚船利炮大举进犯的时候,古老帝国只有受击而溃了。

一个古老文明难道从此就要寿终正寝了吗?志士仁人的回答是大声呐喊,身体力行,以期救中华民族于危亡,那种彻底的奉献精神、信念的力量直至默默的工作都是后世罕有的。政治家、斗士以其轰轰烈烈的行动而备受社会历史的注目,而文化工作者,尤其是近代社会中地位渐次丧失的文化工作者的顽强努力却未见得受到大众的瞩目。然而,后者默默的工作发挥着更

^① 参见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 268 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坚韧、更持久的作用，也许比革命家的改朝换代还要影响深远。文化知识的传播提高了民族的素质，延续了民族的精神，覆盖整个社会，使古老文明薪火相传。

中国近代的困境，归其原因，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社会未能跟上世界发展的潮流，未能步入现代化进程而引致的失败。中国历史上一直拥有优越的华夏文明，周边国家或是中华帝国的附属国，或在汉文化圈的遮蔽下。中国传统社会实用性、经验型的发明不断，加上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使中国人形成了世界之大惟我独尊的观念。就四大发明而言，中国发明了造纸术、火药、印刷术和指南针，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结构和生活层次，在某种意义上，或许还助长了自我中心主义。近代中国在生死存亡的抉择、苦斗过程中，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背景可以追溯到 1840 年爆发的鸦片战争。因为战争的爆发，中国所处的被动挨打局面，才渐次唤起中国人的觉醒，思考中国社会的前途。这也决定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特点即被动的现代化。在长期的闭关锁国、惟此为大的局面后，洋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人探出头去，发现外面的世界竟然迥异于华土。

鸦片战争惊醒了中国人的千年沉梦，中国社会从此进入了一个大变动时代。这个时代，一方面西方列强以武力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及其学术思潮、科学技术大量涌人；另一方面，社会动荡，封建王朝日趋没落，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中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晚清统治者力图维护其统

治。这两股主要势力造成中国社会的混乱、贫瘠与保守。除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统治者、政客以外，中国社会还有一股力量，即来自人民的爱国者、先进的知识分子。他们从现实的危险中惊醒过来，从传统的玄学思辩和典籍考据转向经世致用之学。空疏的理学和烦琐的考据于世事无补，研究农政、刑名、典章制度、河工、漕运、币制、边防史地等实学，能在具体的社会变革中起到一定的作用。经世致用的实学因而形成了一种新思潮、新学风。同时，社会时代的发展使得各种政治主张登上了舞台，从吁求改革内政、反抗外侮、振兴国家到单纯讲求学习西方坚船利炮的维护封建统治的洋务派思想，再到要求改革封建专制制度、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改良派，仁人志士采用各自的方式来实现救亡的目标。

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与救亡图存紧密相连。救亡是迈向现代化的第一步，现代化又最终能有效地解救国家于危亡。有学者指出，中国现代史交织着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奏。^① 启蒙是思想意义上的，启蒙的后果必然是民智的提高，国家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如前所述，中国现代化进程是一种被动的现代化，一种防卫的现代化(defensive modernization)，它的原动力不是自身内在的需要，因为中国社会原本是一个自足的系统，一个隐士王国(汤因比语)。中国现代化进程正符合费正清所谓的“挑战”与“回应”模式，是传统的中国社会面对西方现代文化的挑战而作出的

^① 参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回应，也是中华民族在文化、社会内部的奋斗、调整、求生存的心路历程。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得先进分子认识到必须改革内政、反抗外侮，虽然这种认识还相当笼统和模糊，只是在器用的层面上强调必须“以夷制夷”、“师夷长技以制夷”，提出了坚船利炮的主张。这种主张在 19 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上层统治集团所采纳，开始由高层官吏推动实施洋务运动。船厂、炮厂直至相当的西式制造局开始出现。60 年代初，清朝统治格局也发生了改变。奕訢、文祥、桂良等中枢大臣改变了一味排外、保守的态度，以较为现实的态度处理政事。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的出现，挽救了急速衰退的政治、经济，清朝出现了暂时的中兴局面。1862 年，曾国藩在安庆设立军械所，仿造火轮船，1865 年在上海设立江南造船厂；1866 年，左宗棠在福州设船政局……这是官办时期。从同治元年（1862 年）到光绪二十年（1894 年），可谓中国工业的发轫阶段，是官督商办的时期。新工业的开端最初是出自军事的需要，以军事工业为先导，以开铁矿、制船炮为第一要务。通过建立军工机械厂和向国外购买船、炮，中国海军在 19 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建立起一定的规模。但是，数次中外海战如 1884 年的中法战争、1894 年的中日甲午战争都是以中国水师的失败、中国人签订丧权辱国的割地赔款条约而告终。器物技术的进步并没有改变中国人落后挨打的局面，在紧迫的政治形势下，政治领袖们以此速效之策来解燃眉之急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并不能彻底解决根本性的问题。比器用层次更深一层的是社会

制度层面。人们从战败和割地赔款中反思原因。最初，一些大臣和官僚只是佩服西洋科技，而坚持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和赖以立国的儒家精神是优越于西方的完美精神。所谓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在我们祖先创造了璀璨文明时，西方人还处于茹毛饮血的时代。中国人似乎惯于吃祖宗饭。器用层面的进步被强行与社会制度的合理性割裂开来考虑。张之洞著名的中体西用说可为代表。到了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维新运动，人们才认识到中国社会制度也存在严重缺陷，需要加以现代化。举例来说，中外战争的胜负取决于军事上的因素，同时还有军事以外的因素在起作用。19世纪中叶，设在上海的江南兵工厂在掌握西方技术方面远远超过了日本。俄国人在参观设在中国西北的兰州兵工厂时，发现那里制造的枪支质量极其精良，惊讶不已。但是，中日甲午海战开战初期的关键性战役，中国海军失败的根本原因并非装备不良，而是弹药承包商在许多炮弹中灌了水泥。这一事实颇能反映问题的症结。维新运动主要推行一种自上而下的变革，建立英国式君主立宪政体。在时人看来，这种政治制度并未激进到抛弃延续几千年的帝王观念，同时又有利于使政治制度适应新时代的需要。既适应传统之“体”，又兼具西学之“用”。在社会运作上，相比之下，东邻日本的现代化道路，其背景与中国颇有相似性，但日本却走了一条与中国不同的道路。日本同样是被外国炮舰轰开大门。1853年，美国准将佩里率四艘军舰驶入日本的浦贺湾，强迫日本开放港口。日本在侵略者的压力下，被迫开放门户。同时，却又以敢于冒险的气魄和能

力，回敬西方的冲击。日本国内也曾发生开港论和攘夷论的激烈争辩，但最终认识到攘夷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门户开放，使日本富强起来，才能使自己有实力对付西方各国。日本明治维新的基本政策就是开放门户，努力与世界各国保持外交关系。同时，富国强兵，以确保国家的独立。在具体措施上，就是普及国民教育，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教育，以促进日本的现代化。^①日本文化传统中有吸纳外来文明的开放心态，对外来文明不仅不加警惕，反而主动输入，改革制度，扶植产业，创建近代式军队。结果在不长时间内成为新起的亚洲强国。日本战胜强大的俄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胜中国不过用了短短二三十年时间。而晚清以后的中国，却陷入了军阀割据、全面内战的局面，并未能抵御西方的冲击，使国家获得独立的尊严。

但无论中国对待西方文明的态度如何，主张废八股、设学校、开办银行，鼓励办报等等做法触动了中国文化的深层，它将产生的影响可能危及统治阶级的根本，因而最终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所镇压，但维新运动所掀起的政体改革由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继承了下来。

西方技术的引进带来了中国社会的变化。器用层面的变化只是文化整体中最低层次的一层，内涵也最为具体。在某种意义上，经济发展代表着器物技术的进步，经济的现代化总比政治

^① 参见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